

金末河北士民遷徙現象初探

鄭 丞 良*

摘 要

金宣宗因應蒙古南侵而遷都汴京，大量官員、軍戶隨之南遷河南，史稱「貞祐南遷」。本文分析河北地區中下級官員與百姓避兵行為，認為「避危就安」是民眾避兵基本原則，離開河北、就近避兵都是民眾可能的選項。若是遠距離避難，河北民眾主要考慮以河南為主、山東為次的南遷避兵方向。南遷具體路線主要有三，分別是太行山東側、漕運河渠沿線以及深、冀兩州進入山東。另外，不少基層百姓選擇就近取得保護。例如投靠世侯或是降蒙，或是在鄉里就地避兵，或是投靠諸如霸州信安水寨、沃州水寨、邢州山寨、相州林慮山寨等等保護據點。至於返鄉的選擇，可以看到留在河北、就近避兵的百姓，往往不待金朝滅亡，便會回到秩序甫定的鄉里。

關鍵詞：貞祐南遷、流民、金蒙之際、金朝、金宣宗

*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Preliminary Study on Migration of Inhabitants in He-Bei during the Late Jin (Anchun Gurun) Period

Cheng, Cheng-liang*

Abstract

The so-called “Zen-You Nan-Qing (migration southward in the period of Zen-You, 1213-1217)” refers to that Emperor Xuanzong (Wudubu) of the Jin dynasty (Anchun Gurun) moved the capital city from Yan-Jing (Zhongdu) to Bian-Jing (Kaifeng) to escape the Mongol incursion. During this incursion, officials of lower echelon, soldiers, and common people migrated southward to He-Nan. This article aims interpret “seek security to avoid disaster” as the incumbent concept of common people to escape military incursion; while to leave He-Bei homeland or migrating to nearby area were both choices. There were three main paths from He-Bei to the south in He-Nan and Shan-Dong: along the route of eastern wing of Tai-Hang Mountain, sailing through the Grand Canal, and, travelling from Shen-Zhou and Ji-Zhou to Shan-Dong. Some people chose to stay in the homeland either surrendered to the Mongols or sought protections from local militias in different spots in the mountains or waters such as Ba-Zhou, Wuo-Zhou, Xing-Zhou, and Xiang-Zhou etc. It is observed that people stayed nearby hometown in He-Bei often moved back home as soon as peace or social order restored, even before downfall of the Jin regime.

Keywords: Zhen-You-Nan-Qian, Refugees, the Turn of Jin-Mongol Period, Jin dynasty (Anchun Gurun), Emperor Xuanzong (Wudubu)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壹、前言

金衛紹王時期（1208-1213）已受到蒙古成吉思汗侵襲，宣宗（1163-1224）即位不久隨即宣布遷都汴京，大批官員、軍隊及眷屬扈從南遷，史稱「貞祐南遷」。十三世紀初期蒙古南侵，造成華北地區政治社會劇烈變化，以往學者已就貞祐南遷、漢人世侯等重要課題進行研究。¹

就基層社會角度而言，蒙古南侵除了造成豪傑降蒙成為世侯，大規模家庭或個人遷徙流動行為也應該是探討此時社會變化的重要課題。據筆者管見，討論金蒙之際華北遷徙活動的先行研究成果，應為吳松弟先生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吳松弟利用《元史》、《元人文集》，注意到河北、河東、山東、關中四地區遷入河南的時機、數量並不一致，南遷民眾以河北最多，河東次之，山東最少的觀點。遷入地以相對安定的河南、陝西以及淮北的邳州、單州為主。²不過，筆者以為先行研究成果雖然指出南遷粗略趨勢，但是無論史料利用、遷徙的多元性、遷徙之社會影響，皆仍有討論餘地。

由於金蒙之際華北流民遷徙牽涉層面相當廣泛，³筆者限於學力，暫且嘗試依地域劃分。本文以河北地區為討論範圍，實際包含金朝中都、大名府、河北東西路等四路。自海陵王（1150-1161）「以天下之力培植之」後，河北地區不僅有大量仕宦文士聚集首都，整體戶口也較北宋更為繁盛，自是金朝核心精華地區。⁴本文試圖

¹ 孫克寬，《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到何之，〈關於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1978），頁11-31。瞿大鳳，〈金元之際的山西漢人世侯〉，《蒙古學信息》，第2期（1999），頁2-7。趙文坦，〈漢人世侯與蒙元關係的演變〉，《文史哲》，第2期（2010），頁130-136。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符海潮，《元代漢人世侯群體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晏選軍，〈金元之際的漢人世侯與文人〉，《中南大學學報》，第13卷第1期（2007），頁82-85。安部健夫，《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頁87-102、369-395。三上次男著，金啟琮譯，《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頁238-250。

² 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4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頁154-163。

³ 例如洪麗珠注意到入元之後部份元廷新貴重新構建金蒙之際家族史敘事，便是拓展此領域的新嘗試。洪麗珠，〈危機即轉機：金蒙之際華北新家族史的建構〉，《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35輯第1期（2019），頁61-75。

⁴ 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第26卷第1期（2008），頁103-135。

討論河北士庶遷徙現象，希冀對金蒙鼎革之際河北社會變化進行基礎研究。

貳、河北士民遷徙選擇

金衛紹王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舉入侵，金軍先後敗於野狐嶺、烏沙堡、會河川，八月哲別（?-1223）入居庸關，抵中都。⁵ 九月，蒙兵前軍至中都。⁶ 隔年八月胡沙虎（1132-1213）弑衛紹王（1168-1213），擁立宣宗，立改年號「貞祐」。此時蒙古兵分數路，其中皇子朮赤（1182-1227）、察合台（1183-1241）、窩闊台（1186-1241）為右軍，循太行山東側而南行，先取河北西路諸州，再掠澤、潞等河東南、北路，以及遼西諸地而還；成吉思汗與皇子拖雷（1191-1232）為中軍，攻河北東路與山東各地。⁷ 蒙古大軍橫掃河北、山東諸地，兵鋒所至，屠城殺戮，焚掠不已。貞祐二年（1214）四月金尚書省奏巡幸南京，宣宗從之，此即是「貞祐南遷」。⁸

關於河北景況，此時「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數城僅存而已。」⁹ 如劉祁（1203-1259）語「金貞祐之亂，河東、河朔名山大川神祠無不灰燼，瓦礫一空」、¹⁰王磐（生卒年不詳）記趙州贊皇縣學亦言「金季兵亂毀拆，唯存一堂。」¹¹ 貞祐二年大量士庶百姓為了躲避戰亂、蒙兵屠殺，紛紛躲避至安全地區，如姚燧（1239-1314）言「金由歲甲戌（按：貞祐二年），宣宗播汴，河朔逃兵之民，皆扶攜婦子，從之而南。」¹² 入元之後，鄧文原（1258-1328）「吾聞金亡，名家右族，走河南北，得脫性命草棘間，率一二為幸。」¹³ 胡

⁵ （明）宋濂等修，《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太祖本紀〉，頁15。

⁶ （元）脫脫等修，《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卷13，〈衛紹王本紀〉，頁294。

⁷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太祖本紀〉，頁17。

⁸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4，〈宣宗本紀上〉，頁303-304。關於南遷後的金廷和戰政策，參見鄭丞良，〈遷都與伐宋：試探金宣宗南遷政策及其轉變〉，浙江省杭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第三屆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11月8-9日。

⁹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太祖本紀〉，頁17。

¹⁰ （元）劉祁，〈中鎮廟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二次印），卷63，頁342。

¹¹ （元）王磐，〈重修贊皇縣學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61，頁248。

¹²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20，〈資善大夫同知行宣政院事張公神道碑〉，頁310。

¹³ （元）鄧文原著，羅琴整理，《鄧文原集》（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據鮑廷博知不足齋輯校

祗遫（1227-1295）「河北郡縣，雖開設守令，而政治威令，解弛沮喪，土寇四起，力不能治，弱肉強食，互相殘賊奔竄，莫知所依」，更是鮮明指出河北百姓面臨秩序解體、弱肉強食的殘酷景象。¹⁴

一、地方官員南遷

貞祐南遷時眾多河北官員紛紛爭取河南職缺，應與尋求南渡避兵機會有關。勸農使李革（?-1218）便言「河北州縣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難。」¹⁵ 此外，由於吏部選調機制，迫使各處地方官員必須前往吏部所在的汴京，方能接受新職。¹⁶ 基於各種考量，大批官員紛紛南遷汴京。楊宏道（1189-1271）自述奔赴河南的因由：「一官不調，未獲祿食，親舊離散，無所假貸。祇服避地之訓，歲九月而有汴梁之行，所以赴詮調，訪親舊也。」¹⁷ 可知楊宏道前往河南雖是「赴詮調，訪親舊」，實則面臨「未獲祿食」、「無所假貸」的困境。楊宏道在途中巧遇為生活奔波的優伶，想起自己同樣為了得到俸祿與親友資助而奔走，因而以優伶自嘲。

元好問（1190-1257）為真定酒使司監蘇車（生卒年不詳）撰寫墓銘，仕宦經歷記載頗詳，列舉如下：

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¹⁸

由蘇車仕宦履歷可知，原先已得親民資序，南遷之後推行新制，只能「再歷諸司」，

稿本），不分卷，〈孫氏先塋碑〉，頁 54。

¹⁴ （元）胡祗遫，《紫山大全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1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四庫全書錄永樂大典本影印），卷 18，〈龍虎衛上將軍安武軍節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王公行狀〉，頁 35 下欄。

¹⁵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7：「貞祐三年三月『己卯，勸農使李革言：『河北州縣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難，宜發元任領戍兵者。不可離則別注以往。』」

¹⁶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7：「貞祐三年二月『丙午，尚書省以南遷後，吏部秋冬置選南京，春夏置選中都，赴調者不便，請併選於南京。』」

¹⁷ （元）楊宏道，〈優伶語錄〉，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1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二次印），卷 10，頁 206。

¹⁸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卷 24，〈蘇彥遠墓銘〉，頁 600。

擔任監稅或監酒等職，得再有羨餘才獲升縣令。另外，由蘇車丁母憂可以推知，其母隨同南遷。這或許蘇車本是真定人，南遷之前又在真定任職有關，因而其與家人一同南遷。

南遷後得到新職者，筆者見有：趙郡平棘（河北沃州）人張溥（生卒年不詳），任南京路亳州衛真縣酒坊使；¹⁹ 涿州定興人李鎬之父（名不詳，生卒年不詳），任官鳳翔；²⁰ 沃州寧晉人高榮之父（名不詳，生卒年不詳），任南京左警巡院使；²¹ 相州安陽人呂忠（生卒年不詳），「登貞祐進士第，監稅於衛」；²² 盧龍趙托（生卒年不詳）「監酒上蔡，義宗播蔡，死蔡亂」；²³ 相州醫者宋某（生卒年不詳），「金徙都大梁，曾大父為尚醫，入內診上脉息，著聲，始析家遷來河南。」²⁴

即便各地官員前往汴京吏部參選，也未必能夠立即得到新職，原因在於金廷控制地區縮減，員多闕少，形成壅塞。²⁵ 因此也可見有河北官員前往河南之後，放棄官職，如漁陽上谷人韓琇（生卒年不詳），曾任慶陽府司錄判官，遷徙至衛，因家境貧困，命其子天麟（生卒年不詳）經商之例。²⁶ 又如保州地方官員孟升卿（生卒年不詳），郝經（1223-1275）〈須城縣令孟君墓銘〉提到：

貞祐初，北鄙用兵，乘輿遷汴，君為供具，截截有紀律，民不擾而備。……已而北兵屠保，尸積數十萬，磔首于城，殆與城等。……河朔亡，奔行在所，……知國運日蹙，不復中振，遂不仕。²⁷

¹⁹（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 61，〈故真靖大師衛輝路道教提點張公墓碣銘并序〉，頁 2664。

²⁰（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 71，〈題李懷遠事系後〉，頁 3025。

²¹（元）胡祇適，《紫山大全集》，卷 18，〈隱士高君墓誌銘〉，頁 19 下欄。

²²（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23，〈故從仕郎真州路總管府經歷呂君神道碑銘并序〉，頁 357。

²³（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25，〈太倉監趙君神道碣〉，頁 397。

²⁴（元）柳貫，《柳待制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51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元至正刊本影印），卷 10，〈元贈中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騎都尉追封南陽郡伯宋公墓碑銘〉，頁 27 下欄。

²⁵（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20，〈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頁 321：「金已蹙國，一闕守者，無慮數人懷告身，致曠數考，無所于任。」

²⁶（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 56，〈大元故奉議大夫中書兵部郎中韓君墓碑銘〉，頁 2523。

²⁷（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抄本影印），卷 35，〈須城縣令孟君墓銘〉，頁 538-539。

孟升卿到汴京後不仕，²⁸或許也與此時仕宦不易有關。也可看到部份南遷官員、吏員放棄仕途後，選擇成為僧、道。釋子廣（1207-1273），保定人，「貞祐避兵徙河南，祖亡，棄吏業，師事南陽縣彌陀院院瑗首座」，可知釋子廣本是吏員，原與家人一同南徙，遭遇家人離亂喪亡後，便選擇出家。²⁹

由於官員任職地區往往不在鄉里，在緊急狀態之下，家屬常有聯繫困難、不知所蹤的現象，甚至家人長期分隔南北。元好問為夾谷士刺（1155-1228）撰神道碑，便提到其身為政府僚屬隨宣宗南遷，但是家屬來不及遷徙，只得留在平州撫寧。神道碑曰：「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卒，乃留幼子、今先鋒使斜烈于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餘二十年。」³⁰可知夾谷一家受限於南北分裂二十餘年，直至汴京陷落，夾谷一家才團聚。只不過，此時其子夾谷斜烈（生卒年不詳）已為蒙古將領，與身為金朝官員的父親卻產生隔閡。

有些官員雖然倉促南遷，但是家屬卻想盡辦法從家鄉趕赴河南，如馮璧（1162-1240）神道碑提到：「初金還汴，通議（璧）將逾河，追及行在所，失公妣夫人趙、瀛、博間。公竄避梗棘，茹苦徒行，勤以事文，哀以求亡。」³¹據《金史》記載馮璧當時人在山東，自單父渡河前往汴京。³²妻、子自真定鄉里出發，卻仍因戰亂盜賊而母子失散。由「失公妣夫人趙、瀛、博間」一句來看，馮璧家屬路線應非宣宗南遷路線，而是先往東行至河間府（瀛），再向南行至山東博州，最後西向渡河抵達汴京。

中都路霸州人郝誠（生卒年不詳）及其家屬亦有相同經歷。王惲（1227-1304）〈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記：

初鈐轄府君（按：郝誠）既南徙，靡所依藉，奉母夫人走汴，中途困乏，置母

²⁸ 貞祐三年十一月蒙兵攻至河北南部彰德府、大名府，保州應在此之前已遭受攻伐。又參見（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47，〈張柔傳〉，頁3473：「丁亥（按：1227年）移鎮保州。保自兵火之餘，荒廢者十五年，盜出沒其間。」由「荒廢十五年」反推，保州應於癸酉（貞祐元年，1213）便已遭受戰爭兵火。

²⁹ （元）胡祇適，《紫山大全集》，卷18，〈大聖山孝思禪院廣公和尚塔銘〉，頁33下欄。

³⁰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冊，卷20，〈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夾谷公神道碑銘〉，頁542。

³¹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20，〈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頁321。

³²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10，〈馮璧傳〉，頁2431：「宣宗南遷，璧時避兵東方，由單父渡河詣汴梁。」

便所，與珂索食塢間，游兵遇，皆驅之去。……兵怒以佩刀刺之，即仆地作死狀，兵委去，因護母與父會。³³

郝誠已先至汴京，妻、子只能自霸州千里跋涉，歷經艱險，前往汴京，途中經常會遇到「遊兵」、盜匪。這些遊兵並非金、蒙軍隊，很可能是地方武裝力量。³⁴

相較馮壁一家離散、郝誠家人遭逢兵難，通州潞縣人郭和（生卒年不詳）及家屬遷徙堪稱幸運。郭和「少樂讀書，長以吏業著稱」，應屬仕宦之輩。

貞祐初，燕不能國，遂避地徙河南，（按：郭和）公奉從母楊挈弟姪至，復還鄉梓，往返數千里間，冒涉艱梗，舉宗全慶，竟不失舊物，是亦人所難能。郭氏之有今日，其祥實開於此。公少樂讀書，長以吏業著稱。且玄之與潞，在昔為轉漕淵會，見聞習熟，故公於綱計為詳。壬辰歲，詔立漕司於燕。明年癸巳，中書粘合公辟公為經歷官。³⁵

貞祐年間（1213-1217）郭和攜家帶眷自通州南遷河南，又攜眷返回通州，「往返數千里間，冒涉艱梗，舉宗全慶，竟不失舊物」，戰亂間能不失一人一物，可謂幸運至極。推究郭和何時北返？據王惲碑文「復還鄉梓」，且未言金亡後郭和遭遇，可以推測郭和應該南渡未久隨即北返，至遲不晚于金亡前夕，便已順利返鄉，故未遭遇俘虜北渡之事。

由上事例不難看出，官員選擇隨同金廷南渡動機不一，固然有生計考量，亦不能否認官員群體與朝廷政策密切牽連的因素。但由於官員往往仕宦外地，未必能與留居家鄉之親屬一同南遷，因而不乏看到親屬離散、尋覓，甚至長期分隔、各自效忠金蒙政權的景象。

二、軍戶南遷

「貞祐南遷」時為數眾多軍戶及家屬也隨同金廷遷至河南。《金史》記田琢（？-

³³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 54，〈資德大夫中書右丞益津郝氏世德碑銘〉，頁 2482。

³⁴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18，〈苗道潤傳〉，頁 2571：「宣宗遷汴，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群盜。」

³⁵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 55，〈大都通州郭氏遷塋碑銘〉，頁 2508。

1219)、沈思忠(生卒年不詳)招集河北中山府、西京百姓四萬人,皆願徙河南。田琢上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可招集其餘也。」沃州刺史又言:「田琢一軍多女直人,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³⁶ 貞祐四年(1216)監察御史陳規(生卒年不詳)上言,內徙河南之河北軍戶多達百萬餘口。³⁷

由於軍戶及家屬遷徙人數過多,太常卿賈益(生卒年不詳)、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未被宣宗接受。³⁸ 此後反對者仍主張此舉動搖華北民心,認為金廷無意固守華北,如高汝礪(1152-1224)言「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遷,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³⁹ 監察御史許古(1157-1230)亦言「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⁴⁰ 另一方面金廷曾討論軍戶是否自行耕種土地?⁴¹ 最後決定以河南財賦供養大量軍戶眷屬,卻也造成南遷後嚴重財政困窘。⁴²

雖然史書記載數十萬軍戶南遷,但筆者搜集到關於軍戶南遷資料為數不多,僅有兩條。張英(生卒年不詳)撰〈李世和神道碑〉提到李世(生卒年不詳)和一家原姓蒲察,本為上京人,後世遷燕。據神道碑載仕宦經歷可知,世和兄弟皆留北地仕蒙,「叔父寶交,南渡後許州軍屯千夫長」,可見蒲察寶交(生卒年不詳)應屬隨金廷南遷軍戶。⁴³

一是遼東蓋州人石璣德玉(生卒年不詳),其墓誌記曰:

貞祐初,以良家子從軍,……積勞至武德將軍。北渡後,□居相、衛間,母杜

³⁶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2,〈田琢傳〉,頁 2249。

³⁷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9,〈陳規傳〉,頁 2406。

³⁸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90,〈賈益傳〉,頁 2001。

³⁹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7,〈高汝礪傳〉,頁 2353。

⁴⁰ 此段無明確繫月,但憑議徙軍戶於河南判斷,應在 6 月至 12 月之間。(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9,〈許古傳〉,頁 2412-2414。

⁴¹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14,〈石抹世勳傳〉,頁 2517:「時朝廷徙河北軍戶河南,宰執議給以田,石抹世勳上言曰:『給田有三害:1、無法立即歲熟;2、若奪民田給之,啟不和之端;3、軍戶無牛;4、軍戶一旦北歸,舊有田宅又有爭奪』切謂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收其晚禾,至春復還,為固守計。」上大悟,乃罷之。」

⁴²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44,〈兵志〉,頁 998。

⁴³ (元)張英,〈李世和神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1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一版第一次印),卷 459,頁 270-271。此例承審查人提醒告知,在此謹以誌謝。

氏，唐相如晦後。……雖菽水無餘，有南陵白華之志。時杜壽登八秩，……時名公贈詩，有「似憐甘旨闕，春風玉芝香」之句。……生女子二人：長適御史康天英，次適河東道提刑按察使姜彧。家府與公交款曲，篤世契三十年。⁴⁴

雖未見「南遷」，但墓誌有言「北渡」，推測石琚德玉應隨宣宗南遷，金亡後北渡。墓誌只言石琚德玉「以良家子從軍」，家世似非顯赫貴族，官品亦只到正六品下武德將軍。⁴⁵ 但是由「名公贈詩」、子女婚配來看，石琚德玉在金亡之後，仍與當時名士顯宦交遊密切，說明其家應非一般軍戶。

由於留下南遷資料之軍戶案例過少，不易統整此類族群人物具體遷徙面貌。《金史》描述南遷軍戶多達百萬口，卻為何入元之後相關墓誌文獻存在如此巨大落差，背後因素是否與家族記憶喪失、重構有關，值得進一步注意。另外，一般認為軍戶南遷是在金廷調度安排之下所進行的集體行為，不過從蒲察寶交兄弟分留南北兩地看來，軍戶眷屬亦多有離散。或許，正是因為離散緣故，讓留在北地仕蒙的李世和一支得以保持家族地位，並為叔父留下一抹軍戶南遷的歷史記錄。

三、平民南遷⁴⁶

貞祐二年十二月，宣宗以和議既定，聽民南渡。河北百姓大量向南遷徙，但是黃河津渡守官頗有刁難，隔年三月宣宗再下詔「諭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卹。」⁴⁷ 七月宣宗聽聞「河北譏察官有要求民財始聽民渡河者，避兵民至或餓死、自溺，特命御史臺體訪之。」⁴⁸ 可見平民渡河困難，沿河津渡應聚集眾多河北百姓。

筆者所見河北平民南遷渡河者，鄉里籍貫大多是真定、深、冀、滄州以南，鮮少更北之地，或許與交通距離有關。若是考量到部份平民乃是獨自一人南遷，交通距離因素可能是更為關鍵的考慮。

⁴⁴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60，〈共畧老人石琚公墓碣銘〉，頁2630-2631。

⁴⁵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55，〈百官志一〉，頁1222。

⁴⁶ 此處「平民」除了指稱從未曾仕宦的百姓之外（包括富戶、商賈），主要試圖對士人官宦及其未曾入仕之眷屬進行區別。換言之，本文將南遷前未有讀書、從事舉業等活動記錄之人視為平民，即使他日後出仕為官，亦不妨礙南遷之時的平民身份認定。

⁴⁷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4，〈宣宗本紀上〉，頁309。

⁴⁸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4，〈宣宗本紀上〉，頁310。

滄州王昌齡（生卒年不詳），其家「世雄于財」，「貞祐初，滄、景被兵破，公以孤童子，能依彊濟難，間行歸汴，抱負奇節，時人未之知也。」⁴⁹ 金正大年間（1224-1231）不僅成為汴京北面元帥府經歷官，金亡後史天澤（1202-1275）還任用王昌齡參議幕府事。深州武強人盧仙（生卒年不詳），「金將亡，武強為秦、趙要衝，歲蹂兵不息，由是徙家睢州。兵浸南，家益蕩析。」⁵⁰ 冀州衡水人趙祥（生卒年不詳），自河北冀州衡水遷至河南蔡州平輿。⁵¹ 趙祥神道碑言「天興癸巳之棄汴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眾難，倡義兵數千為帥。」⁵² 金亡之後，趙祥降蒙，成為攻宋前鋒。⁵³ 河間高用（生卒年不詳）先北遷至霸州信安，不久「貞祐南播，舉家渡河，客陳、蔡間。」⁵⁴

邢州沙河縣人張英的遷徙經歷較為特殊，自邢州南遷至鄧州南陽之後，又返回邢州：

（按：英）長值兵亂，攜家南遷，渡河居鄧之南陽，左丞公（按：文謙）實生於茲。居三歲，聞河北稍安，遂北歸到鄉。中值兵亂，入西山逃避。暮夜聞有追兵，同行者數百家，倉皇盡棄嬰孺，唯軍資府君夫婦抱負幼子，獨不忍捨。同行者恐其累己，往往詬詈，府君莫之恤，竟以保全。⁵⁵

南遷時間點應在貞祐二至三年河北大亂，三年後便是興定元至二年（1217-1218）左右。此前蒙古主力西征，木華黎（1170-1223）主攻河東，河北相對穩定，但是興定元年八月木華黎攻河北東路遂州、蠡州，十月攻河北西路中山府、磁州與山東。⁵⁶ 碑文所述張英聽聞河北恢復秩序，便攜妻、子返回家鄉，但是又遇到追兵，躲入太行山區，正好吻合興定元年河北局勢由和緩到新一波戰事的發展。

⁴⁹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47，〈故真定五路萬戶府參議兼領衛州事王公行狀〉，頁2225-2226。

⁵⁰ （元）袁桷著，楊亮校注，《袁桷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31，〈盧母王夫人墓誌銘〉，頁1455。

⁵¹ 關於趙祥鄉里，據神道碑言：「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為冀之衡水人，又為蔡之平輿人」，似乎應認為河東代州，但是趙祥金末領軍作戰，應是親身經歷南遷過程，若是自代州南遷，恐不應言「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峙」，且言「始為冀之衡水人」，暫認定趙祥應生長於冀州衡水。

⁵²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18，〈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頁284。

⁵³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2，〈太宗本紀〉，頁34。

⁵⁴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下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影刊洪武本），卷19，〈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頁5上欄。

⁵⁵ （元）王磐，〈張氏先德之碑〉，李修生主編，《全文文》，第2冊，卷62，頁263。

⁵⁶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太祖本紀〉，頁19。

此外，「同行者數百家」一句值得注意，一方面顯示部份河北百姓南遷僅是臨時避兵，無意長期停留；另一方面，興定二年河北行省侯摯（?-1233）請放河北百姓北渡耕種，⁵⁷八月時又重新宣告「禁北歸民渡河」，⁵⁸可見張英及其他河北民眾應是敏銳地把握官方短暫放鬆北渡政策的轉變時機。

部份平民家庭憑藉財富、經商，在南遷之後不僅繼續維持家族生計，反而更加提升家族財勢。真定行唐人劉信（生卒年不詳），其子劉濟（生卒年不詳）墓碑銘曰：「（信）以植產致富，貞祐兵，避地陳、潁間，散財濟眾，人多傾附。正大末，所在遊騎充斥，令民團結相保，眾推公充鄉義兵都統，已而歿于事。」⁵⁹可見劉信在南遷後，憑藉財富凝聚眾人，雖然舉事未成，但是其子劉濟入蒙後受鄉人董珍賞識任職大名府，家族地位並未因南遷而下降。

相州臨漳人王政（生卒年不詳）原本經濟基礎尚可，南渡之後因購買田畝，反而累積更多財富。胡祇遹記：

貞祐中，金遷汴，奉父母居陳之項城。時眾以避兵失鄉井，例不聊生，公買田千頃，因以致富。仰食役力親依者如父母，歲久不忍相舍去。金亡北渡，流離頓挫之際，罄囊橐以濟貧乏親戚，鄉里老幼，困病難於徒步者，車載以歸。既復桑梓，時移世變，田園廬舍，已為豪強之所有。因餘貲以通有無，再致豐厚。⁶⁰

王政與其父母妻子全家不僅順利自相州南遷，更因在陳州項城購買土地千頃，招徠佃客耕種。金亡之後，北返相州雖受河津守官刁難，返鄉後原先田園皆被豪強佔有，只能選擇經商，⁶¹最終仍「貲雄城市」，成為相州巨富。⁶²

⁵⁷（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08，〈侯摯傳〉，頁2387：「侯摯行省河北，上言：『臣近歷黃陵崗南岸，多有貧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邀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姦？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付尚書省，宰臣奏『宜令樞府講究』，上曰：『民饑且死，而尚為次第何耶？其令速放之。』」

⁵⁸（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5，〈宣宗本紀中〉，頁339。

⁵⁹（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55，〈故提刑按察簽事劉公墓碑銘〉，頁2503-2504。

⁶⁰（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16，〈王晉卿父王隱士神道碑〉，頁10上欄-10下欄。

⁶¹（元）張之翰，《西巖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4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四庫全書錄永樂大典本影印），卷20，〈王君行狀〉頁3下欄-4上欄：「壬辰，汴梁破，人皆北渡，君輒罄其家之產以濟貧病，仍以二車載鄉里不能全活者至最。其妻徒行。及河，車為守渡官奪去，君仍還相下。回看曩昔之田園，已無餘業，遂作往來之商賈，積有豐貲。」

⁶²（元）張之翰，《西巖集》，卷14，〈王晉卿母呂氏慶八秩詩序〉，頁1下欄。

雖然可以見到河北富戶或具經商背景者南遷，但是在筆者整理資料當中，卻未見到金朝晚期河北商人南北遷徙往來，從事商業活動。這種資料不足的狀況，並非代表此時河北地區商業陷入停頓。金朝河北地區聚集眾多士庶、軍戶，又是京畿所在之地，商業繁榮不在話下。即使受到蒙古戰爭影響，若干商業重鎮依然發揮作用。例如漢人世侯賈輔（1191-1254）所在的保州：

西盡常山之尾，繖出鎮定，左轉蜚狐之口，東包河間，出九河，南入冀野，北盡涿、易，橫絡上谷、盧龍之塞，而跨有燕、趙恒岳之鎮，有滹沱、涿、易之浸，有桑麻魚鹽之利，棗栗五穀之饒，金鐵織績之產，河朔諸道，車轍馬足，皆出其間，四方之珍充羨，而貨泉川流，遂為一大都會。⁶³

《金史》記載貞祐三、四年（1215、1216）河北大饑，許多商旅從事南北糧食運輸，卻因為金廷嚴格控制河南物資北渡，採取高稅率的放行政策，讓部份河南物資流向河北。⁶⁴ 尚書左丞侯摯明確提到商人的角色：

觀、滄等州斗米銀十餘兩，殍饑相屬。伏見沿河上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為之。⁶⁵

監察御史許古亦反對清野之計，說：「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⁶⁶ 以上明顯指出金、蒙之際河北地區持續存在熱絡的商業活動。至於後世行狀、墓誌、神道碑為何鮮少提及金末家世先祖經商活動，則留待日後再行討論。

南渡時尚未入仕之士人亦屬平民階層。部份名聲較高、才能出眾之士人，較有機會得到賞識，受聘為幕僚，如邢州唐山人霍珪（生卒年不詳），「避兵裕州，帥府聞其材，辟充幕官。」⁶⁷ 一般河北士人南遷之後，多是隱居讀書。如薊州玉田人

⁶³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 35，〈左副元帥祁陽賈侯神道碑銘〉，頁 561。

⁶⁴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11：「（貞祐三年八月）乙卯，增沿河關糴之法，十取其八，以抑販粟之弊，仍嚴禁私渡。」

⁶⁵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8，〈侯摯傳〉，頁 2386。

⁶⁶ 此段無明確繫月，但憑議徙軍戶於河南判斷，應在 6 月至 12 月之間。（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09，〈許古傳〉，頁 2412-2414。

⁶⁷ （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 15，〈霍僉事世德碑〉，頁 7 上欄。

楊時照（生卒年不詳），「嘗避地河南。」⁶⁸ 雄州容城人劉秉善（生卒年不詳）、秉德（生卒年不詳）兄弟，秉善「貞祐之變，鄉豪以國命推為萬人長，遂逃避河南」；秉德「貞祐間，避地河南，隱于豫州之許封山」，稍後興定二年中舉登進士第。⁶⁹ 霸州信安人杜瑛（生卒年不詳），「金走汴，先生扶奉渡河，寓緱山，養親讀書。」⁷⁰ 劉伯熙（生卒年不詳），「崇慶之變，遂不就舉。……貞祐初，從乘輿入汴。」⁷¹ 著名士人麻九疇（1182-1232）自易州南遷至許州鄆城。⁷² 燕人崔遵（生卒年不詳）「南渡，輟科舉不為，居嵩山下，以讀書作詩為事。」⁷³ 真定人劉遇（生卒年不詳）「南渡，為國史院書寫。已而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為鄆州帥府經歷官，遇害。」⁷⁴

元時著名學者竇默（1196-1280），洺州肥鄉縣人，據其神道碑曰：

年二十，值國朝兵南下，親屬亡沒，家業蕩盡，惟餘一身，暮夜潛出，收親屬之可識者埋瘞訖，即南走渡河，依母黨吳氏。居三年，有清流河醫者王氏妻以其女，且授公以方脈之術，公由是生理贍足，平昔義理之學得所養而日進。及河南破，又喪其家，由陳走蔡。⁷⁵

《元史·竇默傳》言竇默幼知讀書，亦屬士人之輩。⁷⁶ 不過，神道碑並未明言竇默南渡後居止，只提到清流河醫者王氏「妻以其女」，讓竇默得以安心讀書，「清流河」究指何處即是關鍵。據明王圻（1530-1615）《續文獻通考》，清流河有河南開封、安徽滁州兩處，後者屬南宋淮南東路，應非竇默南遷之處。若是前者無誤，清流河應指潁水，位處開封南側，經鈞、許州，在許州臨潁縣匯入潁水。⁷⁷ 可見竇默

⁶⁸ （元）魏初，《青崖集》（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34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5，〈庸齋先生哀挽詩引〉頁32上欄。

⁶⁹ （元）劉因著，商聚德點校，《劉因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卷25，〈先世行實六條〉，頁430-431。

⁷⁰ （元）胡祇適，《紫山大全集》，卷18，〈緱山先生杜君墓誌銘〉，頁6上欄。

⁷¹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房山先生墓銘〉，頁535。

⁷² （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2，頁14。（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26，〈文藝志下〉，頁2740。

⁷³ （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卷3，頁29。

⁷⁴ （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卷5，頁44。

⁷⁵ （元）王磐，〈大學士竇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62，頁271。

⁷⁶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58，〈竇默傳〉，頁3730：「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會國兵伐金，默為所俘。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惟默得脫歸其鄉。家破，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竟亡，扶病藁葬。」

⁷⁷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9，明萬曆刊本），卷12，〈田賦考·河渠考中·河南開封府〉，頁740。

南渡後應是在鈞、許一帶生活，直至金亡再向南往陳州、蔡州遷居。

河北士人隨金廷南遷者人數當不止於此，但由以上數例可見，這些士人即使鄉里籍貫距離河南頗遠，仍選擇冒險跋涉，除了躲避戰禍之外，或許與期盼金廷中興的心理有關。以熟稔樂理的盧龍趙侃（1179-1259）為例：

金末南遷，校量鐘律，獨黃鐘抑而不揚，既至汴，林鐘復爾，雖更鑄尚然。竊自嘆曰：「八音與政通，陰陽消長所在，可以卜時之治忽，中興其不竟乎！」既而金亡。⁷⁸

可見趙侃南遷之前仍對金廷中興保持信心，甚至不妨進一步理解為：正是基於對金廷中興的期待，方才追隨宣宗南遷汴京。隨著局勢惡化，對金廷不再抱有期待，部份人士便可能選擇返鄉，具體事例詳見後文。

由以上討論可以看出幾點：首先，未入仕之士、農、工、商皆屬於平民群體，遷徙與謀生皆必須自立自活。部份具營生逐利才能者，在亂世中反而得以積累財富。其次，平民南遷雖是自主決定，但能否順利南渡黃河關津，卻受金廷河防政策、官員管控影響。即使如此，仍可看到部份南渡民眾觀望河北局勢發展，利用政策調整之際、鄉里秩序稍穩隨即北返家園。最後，士人南遷後不乏受聘擔任幕僚，或是參與科舉進而入仕，固然與謀取生活所需密切相關，但或許也反映出寄望金廷中興的心理狀態。

四、其他遷徙方向

以上皆為河北遷往河南之事例，事實上尚有向東、向西、向東南等遷徙選擇。筆者所見向東、向西皆有一例。郭琪（生卒年不詳）在中都路大興府灤陰城失陷之時，攜帶其子郭汝海（生卒年不詳），向東行至灤河。王鶚（1190-1273）〈郭氏新塋碑〉文云：

（琪）仕金為□東機察使，……貞祐初，灤陰城陷，老幼皆被屠戮，三生皆失所在，與劉公獨攜公禱于火神廟，願保護此兒，使郭嗣不絕。時公七歲，行至

⁷⁸（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48，〈盧龍趙氏家傳〉，頁2266。

灤河，力不能負，欲遺棄兒而去，俄一赤犢橫來，扶置其背，安穩還家，多獲火神之力。⁷⁹

灤河流經北京路、中都路平州，自灤州入海，無論郭琪、汝海往北京路或平、灤一帶，皆非前往河南方向。或許郭琪意圖返回遼東，不過郭氏父子並未遠離燕京，據王鶚續言：「庚寅（按：1230年），朝廷立十路徵收課稅所，耶律丞相知公才，奏充燕京都稅司。」可見至少在金亡之前，郭氏父子已返回燕京。客居燕京的史鐸（生卒年不詳）及其母親遷徙經歷頗複雜。據吳澄（1249-1333）所寫墓誌銘云：

家世汴人，金季徙燕。曾大父以下俱葬京城南門外。大父伯賢仕金，主縣簿。父正甫業儒，年三十而卒。母西京趙氏，金宣武將軍、伍州年山倉草監諱根之女，年二十七而薨。子生始八歲，歸父母家。⁸⁰

史鐸先祖為汴京人，至少在曾祖父一代已遷居燕京，據「曾大父以下俱葬京城南門外」，其祖、父若皆葬於燕京南門外，或與貞祐三年蒙古攻克燕京一事有關。此時史鐸僅八歲，隨其母歸母家，其母為西京趙振（生卒年不詳）之女，因此推測史鐸與趙氏應是貞祐年間自燕京向西返回西京雲中。⁸¹

以上選擇向東、向西遷徙兩例，應是少數個案。據筆者管見，河北士民遷往山東避難，應是僅次河南的選項。清州趙成遷往山東濟南府，趙孟頫（1254-1322）記其墓云：「由祖（友）以上，世居清州西流河之南蔡家里。金末貞祐中，考（成）逃難來濟南，卒葬歷城西南龜山之下十里河之原，故遂為郡人焉。」⁸² 另外，冀州楊氏遷往山東泰安州，張養浩（1270-1329）撰楊氏先塋碑文云：「楊氏，其先冀州棗強人，由避金季亂，徙泰安，自高祖又徙齊之陽邱，遂占名數濟南。」⁸³ 山東緊臨河北，交通便利，又無黃河渡津守官刁難，原本便應當是河北士民避難選項之一。

⁷⁹（元）王鶚，〈遼昭勇大將軍中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郭公新塋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卷246，頁35。

⁸⁰（元）吳澄，《吳文正公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影印），卷37，〈史振之墓誌銘〉，頁14下欄。

⁸¹雲中應是金境最早恢復地方秩序的區域，趙氏攜子返回西京，可能不僅是出自情感考慮，或許亦有理性分析。

⁸²（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卷8，〈趙君謙甫墓碣〉，頁207。

⁸³（元）張養浩，《歸田類稿》（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第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卷11，〈章丘楊氏先塋碑銘〉，頁18上欄。

貞祐二年蒙古軍隊北撤之後，「丙子歲、丁丑歲（按：貞祐四年至興定元年，1216-1217）薦饑，人相食」，⁸⁴河北接連數年遭遇嚴重饑饉，大量河北饑民被逼前往山東，更是成為當地棘手課題。林應開（生卒年不詳）〈龍泉寺碑〉描述當時河北饑民吃人的慘狀：「先是，河朔餓鄉氓強梁者逃入是山（滕縣靈山），噬嚙生人，骸骨狼籍。殿內外白晝鬼泣，拋擲瓦礫，累歲人跡不到。二僧棲止自如，斂收院骨莫瘞之。」⁸⁵ 滕縣已在濟南、泰安、兗州以南，可見河北饑民襲捲山東的範圍，並未僅限緊臨河北的區域而已。若加上先前已說明部份河北士民先經山東，再前往汴京的狀況，前往山東的河北士民應當不在少數。

參、河北士民遷徙路線

前文概述河北基層官員、士庶百姓南遷狀況，本節依據當時交通路線與墓誌材料，嘗試討論河北士民西線、東線與東南線為主的三條主要遷徙路線。

一、西線

雖然金宣宗不屬於本文關注的「士民」身份，但是宣宗自燕京南遷汴京路線，應是資料最豐富完整之交通路線，或許可藉以瞭解河北士民前往河南的一種可能路線。以下整理《金史》〈宣宗本紀〉所載宣宗自燕京南遷汴京時日、途經城市，藉以勾勒基本路線：

五月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涿州定興。……丁亥，次安肅州。……癸巳，次中山府（即定州）。……六月癸丑，次邢州內丘縣。……戊午，次彰德府（即相州）。……庚申，次鉅橋鎮。……壬戌，次宜村。……七月車駕至南京。⁸⁶

⁸⁴ （元）李治，〈太傅忠烈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48，頁38。

⁸⁵ （元）林應開，〈龍泉寺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一版第一次印），卷698，頁374。

⁸⁶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4，〈宣宗本紀上〉，頁304-305。

宣宗自中都出發，路經涿州、安肅州、中山府、邢州至彰德府為止，皆為河北西路。「鉅橋鎮」《金史》未載，若依《水經注》、《史記》所載鉅橋位在曲周、平鄉一帶，宣宗南遷路線將會由邢州內丘，南行至彰德府後，再北回至洺州曲周，此種曲折行程在華北情勢緊急時刻，顯得格外不合情理。因此鉅橋鎮所處地點，當後續再考，本文暫不推斷。⁸⁷

「宜村」，據《金史》〈地理志〉載「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衛州）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為倚郭」；⁸⁸ 〈河渠志〉載明昌五年尚書省「今擬先於南岸王村、宜村兩處決堤導水。」⁸⁹ 可見宜村應是衛州支郡所轄，地處黃河南岸，離胙城不遠。宣宗行經彰德府之後，離黃河已不遠，雖不知鉅橋鎮所在，但由抵達黃河南岸宜村一事，顯見宣宗南行應由李固渡渡過黃河。

此條路線大抵行經河北西路，一旦渡過黃河，便已抵達汴京。據南宋使金相關記載，宋人抵達汴京之後基本上循行同一條路線前往中都。⁹⁰ 可見此條路線應是長期扮演聯繫中都、汴京的政治性路線。除了政治、外交等意義之外，此條路線尚有安全性特點。南遷士民萬一遭遇蒙軍、盜匪，皆可隨時逃至太行山區躲避，因此筆者以為無論交通時程、安全顧慮，此條路線應是主要考慮遷徙路線，河北西路百姓尤其應當優先選擇此一路線。本文所舉雄州劉秉德、雄州釋子廣、保州孟升卿、邢州霍珪、邢州張英、洺州竇默、相州王政、相州宋某諸例，較有可能依此路線南渡。正因為如此，河北南境、黃河北岸渡口才會湧入大量流民，宣宗還特地下詔要求津渡守官加速放行。

二、東線

河北東路士民百姓如欲南遷，除了可以就近轉入上述太行山東側路線，另外尚可利用南北走向的漕運河渠，前往衛、濬、滑諸州，伺機南渡。此條漕河渠道原是黃河故道，《金史·河渠志》記其行經州縣，有：

⁸⁷ 承審查人告知現今亦有鉅橋鎮之地名，位處河南省鶴壁市淇濱區。依金代地理相對位置而言，正在相州之南、滑州西北，與宣宗本紀所載路線相吻合。

⁸⁸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25，〈地理志〉，頁 608。

⁸⁹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76。

⁹⁰ 關於南宋使臣前往金廷路線，范成大、樓鑰等人皆有相關記載。參見陳學霖，《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頁 241-284、285-338。

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清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饋，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壩，汧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京師。⁹¹

漕河是為燕京通輸山東、河北糧食，自是許多河北、山東商旅往來路線，自北往南有流經通州、大興府之潞水；清州、滄州、景州、恩州、大名府、滑州之舊黃河。此外由西向東之衡水、漳水亦扮演運輸角色，將河北西路物資匯集霸州信安之後，再向北運至通州。由此可見，通州乃是燕京漕運樞紐，霸州信安亦是重要轉運之地。

不可否認的是，承平時期的漕運路線在戰亂時期未必是遷徙首選，除了距離較遠的客觀不利因素之外，「河渡梗塞，（舟人）往往沉舟而去」，⁹²也讓漕運功能喪失。不過，漕河路線對貞祐年間因避兵避荒而選擇遷徙的民眾而言，追逐沿河州縣的倉庫糧食，如前引文提及「恩州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或許即是逃難流民與饑民的考慮路線。上文舉出薊州韓琇、霸州高用與杜瑛三人南遷，雖然無法具體考察遷徙路線，但是應多少利用此條路線。

三、東南線

黃河自大定二十二年（1182）改道東南，循曹、單州東行之後，河北、山東已無黃河阻礙，地勢連成一片，減少遷徙障礙。中都永清人畢叔賢（生卒年不詳）便是自中都前往濟南章丘避難，元好問撰神道碑言：「貞祐之亂，侯甫年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為遊騎所馳，因逃難散走。」⁹³

前述馮璧妻、子自真定府路經山東，方才前往汴京與馮璧會合，以及大量河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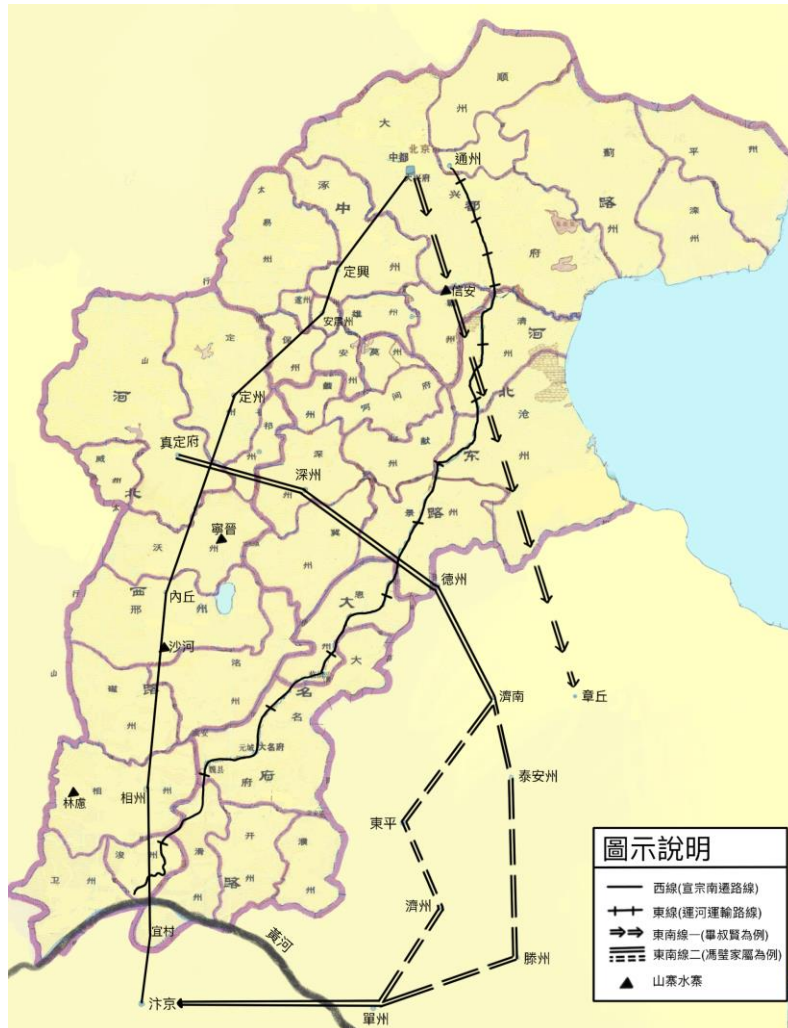
⁹¹（元）脫脫等修，《金史》，卷27，〈河渠志〉，頁682。

⁹²（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35，〈崔氏世德銘〉，頁547。

⁹³（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冊，卷30，〈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頁621。

饑民前往山東滕縣尋食，可知當時自河北往東南方向進入山東，亦是一種遷徙考量。

馮璧家屬自真定府出發，如欲前往山東，必須經過深、冀兩州，自德州進入山東濟南。至於如何自濟南前往汴京，若以馮璧自單父渡黃河為例，自濟南向西南行經東平府至濟州，或向南行泰安州、兗州至滕州，以上兩條支路皆可向西到南京路單州單父縣渡過黃河，持續西行經歸德府、睢州，便可抵達汴京。倘若以上推測成立，除了馮璧妻、子之外，真定府劉信、深州盧仙、冀州趙祥在東、西兩線之外，亦可能採取東南路經山東，再前往河南。



【圖一】河北南遷大致路線圖

資料來源：

(一) 底圖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 6：宋遼金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6 重印），頁 46-47。

(二) 事例史料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冊，卷 30，〈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頁 621。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4，〈宣宗本紀上〉，頁 304-305。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27，〈河渠志〉，頁 682。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20，〈中書右三部郎中馮公神道碑〉，頁 321。

四、遷徙地點

從遷入地點來看，除了一例前往陝西鳳翔之外，其餘河北士民南渡之後，有十例選擇到陳、潁、蔡、唐、裕、鄧等接近金、宋邊界之地；有九例選擇到衛、洛、汴等臨近河北故里，其中五例皆與任官、軍戶身份有關。即使不計因任官前來蔡州之趙托，但是亦有約莫半數河北士民來到距離較遠的河南南境，比例不為不高。此一現象或許與河南閑田眾多，金廷以租稅減免方式鼓勵河北百姓前往耕種有關。⁹⁴

另外，從遷居地點可以發現河北士人與河東士人的差異。元好問為河東臨晉陳謙仲（生卒年不詳）撰墓誌時提到：

遭貞祐癸酉之兵，棄還鄉里。已而南渡河，愛永寧山水之勝，遂欲終隱。……未幾，謝病去。三鄉，大夫士所聚：賈吏部損之、趙漕使慶之、麻鳳翔平甫、劉鄧州光甫，日有觴詠之樂。時猗氏薛曼卿、女几辛敬之、定襄趙宜之、邑子和獻之，皆高人勝士。君從容其間者餘十年。洛西盛集，此一時也。⁹⁵

賈損之（生卒年不詳）、趙慶之（生卒年不詳）、麻平甫（生卒年不詳）、劉光甫（生卒年不詳）、薛曼卿（生卒年不詳）、辛敬之（生卒年不詳）、趙宜之（生卒年不詳）、和獻之（生卒年不詳）等官員與名士齊聚三鄉。絳州曲沃人許國禎（生卒年不詳）亦避兵嵩州永寧。⁹⁶澤州李俊民（1175-1260）也是徙居嵩州鳴皋山。⁹⁷可見河東南遷士人不少選擇遷往嵩州永寧、三鄉一帶，形成河東名士避難聚集之地。

與河東士人遷徙現象相比，河北士人南渡之後，除了直奔汴京換取官職、從事舉業，便是零星繼續南遷至更安全的地方，並未形成另外聚集中心。由此亦可看出多數河北南遷士人除了避禍心理之外，多是基於對金朝政權的認同、維繫仕宦身份等現實考量選擇南遷；南遷之後，河北士人橫向聯繫有限，不若河東士人透過集會、聚居等活動凝聚較強的鄉里意識。

⁹⁴（元）脫脫等修，《金史》，卷100，〈李復亨傳〉，頁2218：「李復亨奏：『河南閑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民，資蓄積之用。』」

⁹⁵（金）元好問著，周烈孫、王斌校注，《元遺山文集校補》（成都：巴蜀書社，2013），卷31，〈故規措使陳君墓誌銘〉，頁1093。

⁹⁶（明）宋濂等修，《元史》，卷168，〈許國禎傳〉，頁3962。

⁹⁷（元）楊奐，孫學功點校整理，《還山遺稿》（收入孫學功點校整理，《元代關學三家集》，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卷上，〈李狀元事略〉，頁417。

肆、河北士民就近避兵

雖然不少河北士民選擇隨金廷南遷，但是「甲戌之秋，南北分裂，兩河山東，郡縣盡廢，兵凶相仍，寇賊充斥」，⁹⁸因蒙軍飄忽、金廷南去釀成河北地區權力真空、盜匪充斥，無疑增添河北士庶百姓長途跋涉、渡河南遷的困難。無論基於遷徙困難或是無意遠離鄉里等主客觀因素，確實不少河北士民選擇在鄉里附近避兵，而不願意長距離遷徙。⁹⁹ 以下便針對河北士民就近避兵的幾種現象進行討論。

一、自力於鄉里就近避兵

沃州寧晉人荊祐（生卒年不詳），其家販書，貞祐年間因河北動蕩避禍，於是將數部善本書板藏至隱密處，待局勢穩定後再返鄉取出。王惲撰墓誌中提到：

貞祐兵，乃取《五經》、《泰和律義篇》、《廣韻》板，闕墟垠中，亂定來視，盜發掘無幾，君悉力補購，隨復為完部。或者云：「初藏書時，善本固多，唯取是三者何哉？」曰：「經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韻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其為善已多。」于時官府生聚，雖稍稍有立，詩書法律，晚生後輩不知為何物，一旦得是，如瞽者復明、迷者之知津也。而又印模精，取直廉，故售者廣，屋日為之潤。所可重者，積而能散。¹⁰⁰

荊祐雖無從事舉業，但由「經者道之本，法者治之具，韻者字之始，文籍所由生」不難看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荊祐一例與本文相關的地方，在於既然藏版於家，可見荊祐起初便無遠離家鄉的想法，而是等待時機返家。其次，荊祐挑選《五經》、《泰和律義篇》、《廣韻》三者，認為詩書、法律、字學是戰亂結束、秩序穩定之後必須的基礎書籍。易言之，荊祐放眼戰亂之後的穩定，而非汲汲營營地為某一政權效忠。

⁹⁸ （元）劉因著，商聚德點校，《劉因集》，卷8，〈澤州長官段公墓碑銘〉，頁156。

⁹⁹ 近年河北考古發掘金蒙之際的家族墓葬，發現河北柏鄉縣（金屬沃州）李姓家族跨越金、蒙連續數代皆葬於此，顯見此家族從未離開柏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柏鄉縣侍中村古墓發掘簡報〉（收入《河北省考古文集（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338-343。

¹⁰⁰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60，〈故趙州寧晉縣善士荊君墓碣銘〉，頁2627。

衛州共城人推某（生卒年不詳），其家業醫，貞祐戰亂引發疾疫，推氏父子曾施藥救治鄉人。墓銘曰：

初，貞祐大兵後，比屋疫作，與考謀曰：「今困厄如是，我寔司命，可坐視不捄？」遂大措湯劑，歷飲閭里間，其乏粥瀋者，復以米遺之，全活甚眾。天興初，盜起西山，約眾東走汴，中途遇劫賊，熟視為公，遽放仗前謝曰：「推君父子，鄉以藥惠脫我輩命，忍以非義加諸？」餘亦獲免。¹⁰¹

貞祐年間衛州兵禍應是指蒙軍橫掃河北之後，南向自衛州繞過河東南路北撤之事。此後並未看到推氏一家遷徙活動，直到天興初（1232）方才因太行山盜賊，選擇東徙汴京，可見貞祐、興定、元光、正大年間（1213-1231）推氏一家應都在衛州共城一帶，並未離開鄉里。

再看以下數例：霸州益津人張某（生卒年不詳），「金亡時，就食獻州交河之建城鎮，因家焉。」¹⁰² 彰德安陽人邢植（生卒年不詳），「幼隨父母竄處林谷，親疫死，從兄林歸里。力樹藝自給，厚德卑讓，以先業奉其兄。後居城中，蓄善貨取贏，頗以財自振。」¹⁰³ 李德輝（生卒年不詳），世居通之潞縣，金末戰亂時，「公方五歲……家纔儲五升菽，夫人舂蓬稗為糧，芣藢莧為菹，活之荒歲。」¹⁰⁴ 由以上三例可見，金末戰亂、饑荒相仍，有人避居林谷、徙家鄰近州縣或是未離家園苦苦支撐，無論何種境地都是堅強自立生存。

二、聚眾降蒙或投靠世侯

不過，在戰事、疾病、饑荒相仍的困境中，除了依靠自身努力存活之外，無論是投靠效忠金朝的武裝力量，¹⁰⁵或是投降漢人世侯、率鄉里族人降蒙，亦是河北士民的一種選擇。

¹⁰¹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 59，〈管勾推公墓碣銘〉，頁 2611。

¹⁰² （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卷 35，〈有元張君墓表〉，頁 16 上欄。

¹⁰³ （元）袁桷，《袁桷集》，卷 27，〈邢氏先塋碑〉，頁 1323。

¹⁰⁴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30，〈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頁 458-459。

¹⁰⁵ 劉恩投靠晉陽公郭文振，見劉壘，〈大元武略將軍遼州知州劉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10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卷 357，頁 580；真定人李顯榮投靠武仙，見（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 29，〈南京路醫學教授李君墓誌銘〉，頁 450。

蒙兵一入漢地立即投降的漢人世侯，自然亦屬於本文定義的未遷徙之河北士民。如蠡州博野王興秀（生卒年不詳）主動投降蒙古萬戶劉伯林（1150-1221）：

公聞兵將至，曰：「丈夫生三十年，而勞苦耒耜，屈壓極矣。今已委身餌敵，暴骨草野，且吾君已棄民，民尚誰死哉！吾有自圖富貴耳。」乃以是撼三十餘村之民：「汝幸從我，我能活汝。」乃將壯士數百輩出蠡疆，迎兩大帥萬戶劉伯林、御史大夫蕭公降。¹⁰⁶

王興秀的心態頗可玩味，認為金主南遷是「棄民」之舉，無須繼續效忠，此時正是擺脫「勞苦耒耜」、「自圖富貴」之時。以往學者討論的漢人世侯，大多便是屬於此種趁勢崛起、造時勢之人。不過，相較之下，筆者更關心在降蒙、自立之間猶豫的河北民眾基層武力，其心態與轉變時機究竟為何？或許藉此可以一窺當時河北民心變化的微妙之處。

隨著時局發展，部份河北士民的心態也開始由單純避兵，轉為投靠世侯以求保障。保定清苑人郭翼（生卒年不詳）與郭實（生卒年不詳）父子便是一例：

金季天兵南下，在所震裂，寇盜橫潰。（郭翼）公密為窟室庇親黨，間出，以金帛易食，竟遇害。……（郭實）為人剛介，嘗墮兵難，逃歸，依蔡國武康公於滿城，從徙保定，官至管人匠總管以卒。¹⁰⁷

保定郭翼亦與河東百姓相似，採取藏身窟穴作為自保方式，但是後被亂兵所殺。其子郭實曾被蒙古士兵擄走，後逃回保定，或許由於親身經歷父親死難、蒙古殘暴，選擇前往滿城投靠張柔。順天府人阮亨（生卒年不詳）一家也是前往滿城：據其墓誌銘：「世陳留人，祖父襲居順天府。……父某，當金亡時，跋涉兵間，遷滿城縣，買田邢家莊，力生務本，委心分義，正直不撓，鄉人化之。」¹⁰⁸ 阮家先人遷徙滿城後尚能買田置產，可見阮家應是地方富戶，選擇投靠地方秩序較早恢復的漢人世侯轄下區域。

¹⁰⁶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卷21，〈懷遠大將軍招撫使王公神道碑〉，頁325。

¹⁰⁷ （元）劉敏中，《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39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光緒十六年孫鏞明泰昌刊本修補本影印），卷9，〈敕賜保定郭氏先塋碑銘〉，頁373-374。

¹⁰⁸ （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光緒十六年孫鏞明泰昌刊本修補本影印），卷3，〈經歷阮公墓誌銘〉，頁15下欄。

定州田嗣叔之父（名不詳，生卒年不詳）自南京路遷至中山（定州），遂定居於此。常借貸貧民甚至焚券消債，應是地方富戶。田嗣叔（生卒年不詳）在金末的地方作為，程鉅夫（1249-1238）撰其神道碑提到：「河北亂，人爭來依，計口給食，人安如歸。盜賊四起，郡縣不能制，乃聚眾自保。聞天兵且至，縱令自便……（降蒙）。」¹⁰⁹ 可見「聚眾自保」是當時個別地方富戶、豪強為求自保或擴展勢力的常見方式。假若不能與更大的武裝力量結合，這些勢單力薄的地方武力，往往最後只能選擇投降蒙古。

貞祐三年河北大饑、盜匪四起，真定藁城人王善（生卒年不詳）與里人未南遷，而是選擇留鄉「協同保聚」，李治（生卒年不詳）在神道碑中提到：

貞祐播遷，田疇污萊，人無所取飽。……乙亥（按：貞祐三年，1215）歲，荐饑，人相食，盜蠭起。公諭里人曰：「今茲喪亂，我輩不有以協同保聚，則為人所魚肉去矣。」眾欽服，推公為冠。公課人種禾三頃，西成將鉅艾，群寇環奪，禦備有方，竟微遺棄之失。累功主本縣簿。¹¹⁰

王善應是先求自保，形成小型武裝勢力。至於「累功本縣簿」究竟屬金官還是蒙官，《元史·王善傳》記王善於戊寅（興定二年、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權中山府治中，發覺武仙（?-1234）謀反，可見王善在此之前已降蒙。可以想見，縱使王善主本縣簿時仍受金命，但應未久隨即降蒙。

洺州洺水人劉榮（生卒年不詳）亦屬地方豪強，金末成為保衛地方的領袖，直至戊寅歲（1218）方才降蒙：

金季，河朔攪攘，歲薦饑所，亞寇盜充□□，骨肉不能相庇，里人相率來歸，賴以保全者甚眾。歲戊寅，歸命國朝，擢署具州長。時新法喪亂，為之立條教，寬力役，朝撫夕煦。居數年，流冗浸還，戶口用增，治為鄰郡最。¹¹¹

碑文固然有粉飾之處，但是漢人世侯在取得個人權勢之外，確實也扮演恢復地方秩

¹⁰⁹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19，〈趙國公田府君神道碑銘〉，頁1下欄。

¹¹⁰ （元）李治，〈故知中山府事王公神道碑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48，頁29。

¹¹¹ （元）李謙，〈都元帥劉恩先塋碑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卷288，頁111。

序的作用。以劉榮個案來說，興定二年降蒙後，碑文言「居數年，流冗浸還，戶口用增」，顯示約莫在興定、元光年間（1217-1223）數年之間，河北部份地區已恢復穩定，原先不少流移民眾已選擇返鄉定居。

大名府館陶人張弼（生卒年不詳）亦是地方豪強，自貞祐年間起便聚眾組織武力，四鄰盜匪不敢侵犯，直至興定四年（1220）方才投降東平行臺嚴實，其墓誌曰：

大安中，聞北邊有警，逆之將亂，預結豪傑，定為患難交，椎牛酺酒，日與眾樂，家貲蕩然不恤也。貞祐初，河朔潰亂，土盜群起，競相吞噬，侯召豪傑立保障團兵自衛，盜不敢犯，遠近皆依焉。推侯為館陶、冠氏等縣都提控。縣當南北之衝，頻年被兵，剽掠殆盡，大失耕稼，不得立食。侯撫存百姓，雖居窟穴、茹草木而無攜去者。庚辰（按：興定四年、太祖十五年，1220），以地附東平行臺。¹¹²

「縣當南北之衝，頻年被兵」，說明館陶因地處交通要道，¹¹³故而軍隊、盜賊、流民不時劫掠。由此間接證明軍隊、流民往往依循既有交通路徑，前文關於漕運河渠可能是遷徙路線之一，或許應有一定合理性。

三、前往河北抗蒙山城水寨

學界以往已注意到金末河北地區出現不少山城水寨，諸如霸州信安水寨、保定水寨、寧晉水寨、真定府與相州地區的山寨，都是當時著名抗蒙據點。¹¹⁴ 本文不擬重覆學界既有抗蒙的角度討論河北山、水寨，而是討論河北士民來到這些山水寨的遷徙行為。

（一）霸州信安水寨

霸州信安水寨應是河北最具代表性的抗蒙水寨。「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鱉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凍不可登」，¹¹⁵如此優越的地理形勢，讓張甫（生卒年不詳）能以信安一隅之地長期抗蒙，並成為鄰近地

¹¹² （元）徐世隆，〈張元帥墓誌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66，頁397。

¹¹³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26，〈地理志下〉，頁628。

¹¹⁴ 王菱菱、李浩楠，〈金朝河北地區抗蒙水寨山寨考〉，《河北大學學報》，第1期（2013），頁22-27。

¹¹⁵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7，〈陳氏先德之碑〉，頁5上欄。

區民眾遷徙避兵的首選。前文提及河間高用便是一例。程鉅夫〈清州高氏先德之碑〉言：「金之亂，天兵略地河朔，攜家往依信安張侯。侯營砦固守，父子常在行間。貞祐南播，舉家渡河，客陳、蔡間。」¹¹⁶ 據此推測高用自河間先抵信安避兵，只是未待太久便「舉家渡河」，或許是因為信安孤懸河北，未若河南更為安全。

學者往往提及河間清州人陳山數次前往信安遊說張甫投降，標誌信安水寨結束抗蒙。¹¹⁷ 不過，信安張甫尚未投降之前，信安尚被包圍之際，已有人逃離信安，選擇返鄉。崔伯玉（生卒年不詳）與父母遷至信安，信安被圍之時其父已卒，伯玉便竊遺骸藏于家。三年之後「與其子（按：仲溫）冒重圍，葬先塋，人以為難」，¹¹⁸ 可見崔伯玉帶著家人、先父遺骸回河間。不過，後文又言：

信安既潰，乃負母攜子，裹糧關刃，隱垣墉，蔽蓬蓽，日數十徙，遇寇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匍匐，完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托大其家。¹¹⁹

此段描述崔仲溫在信安失守之後，負母攜子返鄉之不易。可見張甫投降前後，信安局勢依然混亂，因此崔伯玉攜母、子與父骨最終返鄉，「人以為難。」另外，崔伯祥（生卒年不詳）則是離開信安後，遷至涿州新城縣，經商有成。元明善碑文云：

（按：崔伯祥）由霸州之信安來登茲籍（按：涿州新城縣）。天兵鄣金，中州版蕩，府君克自特達，不顧流俗，樹粟則農，逐利則商，生殖既敏，家範迺肅，解衣衣寒，推食食餓，鄉里歸心焉。¹²⁰

據元明善文字看不出崔伯祥是否與崔伯玉為親屬關係，但至少明確知道兩支崔姓族人在晚金時期不約而同前往信安避難，信安抗蒙結束後又各有發展。涿州新城人孫

¹¹⁶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 19，〈清州高氏先德之碑〉，頁 14 上欄-14 下欄。

¹¹⁷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 7，〈陳氏先德之碑〉，頁 5 上欄：「（陳山）大安初，守居庸關，聞太祖神武仁聖，必有天下，以兵內屬，為平陽、太原等路軍民都元帥，後以年老歸信安。金主南播，河北、山東群盜并起，有號兩淮張者據信安，元帥（山）單騎入謁，說令北歸，弗聽。環信安百餘里皆水澤，有蒲藕、魚鱉可賴以食。春秋積潦，車馬不得進，冬以水沃城則凍不可登。張恃以為固，數喻禍福，終不聽。壬辰，將帥滅金，乃慷慨言曰：『今天下已定，君保一孤城，欲何為耶？生民何罪，城且屠矣！』張感動從之。」

¹¹⁸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 35，〈崔氏世德銘〉，頁 548。

¹¹⁹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 35，〈崔氏世德銘〉，頁 548。

¹²⁰ （元）元明善，〈大元新城崔氏先德之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2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一版第一次印），卷 761，頁 381。

義（生卒年不詳）、孫得成（生卒年不詳）父子，亦是晚金自新城遷至信安，結束抗蒙後再返回新城。¹²¹

綜以上事例，可以發見與霸州信安有關的遷徙活動，並未侷限霸州本地，包括北向涿州、南向河間府等地民眾都有與信安往來現象，由此不難推測信安招徠遷徙流民的幅射範圍。

（二）沃州水城與山寨

沃州寧晉水城的出現時機、地理環境皆與信安水城相似，「時兵荒歲饑，人相食，縣東大澤周匝數百里，中有城曰瀝城。」¹²² 除了學者注意到寧晉人王義（生卒年不詳）與金將爭奪寧晉水城之事，另外，寧晉人李讓（生卒年不詳）事跡雖未明言與寧晉瀝城有關，但是據其墓銘：

貞祐初，河朔失守，所在寇盜充斥，日相吞噬。公慨然輟耕墾上，團結鄉豪，游獵陸澤荊藺間，以保庇井邑為事，蓋有所需，以明歸附之志。歲己卯（按：興定三年，1219），天兵南下，公與兄直，首率里人迎拜歹兒那顏於軍門，嘉其效順，授直行寧晉縣事，公管軍總校，仍聽元帥蔡國公節制。¹²³

可知李易（生卒年不詳）屬於地方豪強，「游獵陸澤荊藺間」或許即是指瀝城所在的城東大澤，平時活動範圍應在寧晉境內，故曰「以保庇井邑為事。」可見他與一班鄉人並未遠離寧晉。最終李易興定三年降蒙，受任命為寧晉縣令。

沃州另有山城一天臺砦，亦是沃州諸縣人避兵之所。真定藁城人董俊（生卒年不詳）貞祐三年（1215）降蒙，隨木華黎征討河北，與武仙拼戰多次。其神道碑言：

丙子歲、丁丑歲，薦饑，人相食，公禁止之，因而教耕作，遂復家給。……沃州諸縣民據天臺砦，既破，降之。他將閱議，取其童男女，公曰：「既全其命，而復奪之子，非人也。」議遂寢。¹²⁴

¹²¹ （元）張養浩，《歸田類稿》，卷13，〈孫府君墓碣銘〉，頁6上欄-6下欄。

¹²² （元）胡祇適，《紫山大全集》，卷18，〈龍虎衛上將軍安武軍節度使兼行深冀二州元帥府事王公行狀〉，頁35下欄-36上欄。

¹²³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卷60，〈大元故廣威將軍寧晉縣令李公墓碣銘〉，頁2634。

¹²⁴ （元）李治，〈太傅忠烈公神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卷48，頁38。

沃州地處真定府南，董俊與真定武仙戰後，移兵向南，征伐沃州天臺砦。攻破之後，董俊似乎力排眾議，未讓砦民全數成為驅口。

（三）邢州山寨

金廷直至興定年間仍控制河北相州以南地區，因此在邢、洺、衛等地屯駐嶺外諸軍之武健者。¹²⁵ 不過，這些武力似乎並未發揮穩定當地秩序的功能。邢州地區水資源豐富，饑荒之時有百姓「夜採魚藕草糧以餬口」，白晝則躲藏地窖，以免被亂軍盜匪烹煮食用。貞祐四年邸順擒殺食人何運副等數百人，其事如下：

丙子石海亂，歲且饑，民瀕於沙河（河北邢州）者，夜採魚藕草糧以餬口，晝穴窖不敢出。海遣何運副者，擁精騎五千，駐之曲河村，得一窖即食之。析骸爨骨，腥聞於天。公不勝忿恚，募健勇者，得數百人，與何鏖戰，生擒何，剖其心以謝眾。¹²⁶

當時河北食人層出不窮，李資榮（生卒年不詳）寨於西山東流碣，其弟於路上發生被食慘事。¹²⁷ 不過，《元史·邸順傳》記載「真定饑，群盜據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盜發地而噉其人，（邸）順擒數百人殺之。」¹²⁸ 一事究竟發生在真定，抑或是邢州，待考。本文暫依記文定於邢州沙河。

在邢州人完顏惟宏（生卒年不詳）事跡中可以看到，興定四年前後「時西山諸堡寨未附，寇盜充斥」的現象：

庚辰歲，天兵南下，太師國王經略河朔，邢遂舉以降，留官鎮守。時西山諸堡寨未附，寇盜充斥，錄事公（潤為都統，署本郡錄事）時或暮夜醉歸，雖兇惡輩，必相與扶送至家而去。¹²⁹

有趣的是，劉潤（生卒年不詳）雖已降蒙，與西山堡寨處於敵對狀態，但是這些堡寨凶惡輩見到劉潤醉酒，仍會扶送他回家，宛如承平時一般鄉里熟識相處景象。

¹²⁵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15，〈宣宗本紀中〉，頁 347。

¹²⁶ （元）魏初，《青崖集》，卷 3，〈重修北嶽露臺記〉，頁 39 下欄-40 上欄。

¹²⁷ （元）李元禮，〈故千夫長李侯墓碑〉，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22 冊，卷 686，頁 133。

¹²⁸ （明）宋濂等修，《元史》，卷 151，〈邸順傳〉，頁 3570。

¹²⁹ （元）張文謙，〈故光祿大夫太保贈太傅儀同三司諡文貞劉公行狀〉，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 22 冊，卷 693，頁 281。

（四）相州林慮山寨

貞祐三年十月完顏惟宏在相州林慮（後改林州）開設帥府，¹³⁰臨近地區士民紛紛前往依託。洺州成安縣人鄭璧（生卒年不詳）前往林慮，擔任元帥府掾史：

金主去燕走梁，以魏、相為邊陲，元帥完顏惟宏握兵，開府於林慮，固巖邑以自守。……既而帥府以孤軍不能立，府事廢而官吏散亡。公以天時人事，推度其疆弱廢興，以定去就。不可復南，挺身還鄉里，依元帥郭侯智。¹³¹

「固巖邑以自守」象徵林慮帥府基本上是依山而設的山寨。另外投靠林慮的河北士人，尚有磁州武安人王無咎（生卒年不詳），張之翰為其撰寫碑銘云：「當金季，宗室維宏開闢林慮，制許選河朔，終場十八人，命之官，公（無咎）主魏縣簿。時天下亂，不樂仕進，挈妻子隱之山中。」¹³² 洺、磁皆為相州北側地區，鄭璧、王無咎應當都屬於士人階層，對金廷、林慮帥府應當都有政治認同。但有趣的是，當兩人眼見「府事廢而官吏散亡」或「時天下亂」而離開林慮時，皆選擇北返鄉里，而非進一步渡河前往汴京。

經由上述討論不難看到，選擇留在鄉里就近避兵或是前往河北抗蒙據點之河北士民，由於不在金廷直接統轄保護範圍，因此更多需要自行判斷尋求自保的策略。以平民而言，其依附對象往往已具游離金、蒙之間的自立性質，最終仍難逃降蒙命運。縱使部份士民選擇逃向抗蒙之山寨水寨，但顯然仍有決定何時離開據點、放棄抗蒙、返回鄉里的自主意識。易言之，未選擇南渡之河北士民可能在一開始便冒著不受中央政權保護的風險，相對地也保有更加獨立自主的遷徙選項。即便最終選擇降蒙，看似叛金不忠之舉卻在「吾君已棄民」的論述之下，轉化為自尋生路之外的政治依據。

¹³⁰ （元）脫脫等修，《金史》，卷 25，〈地理志中〉，頁 606。

¹³¹ （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 15，〈成安鄭氏世德之碑〉，頁 13 上欄-13 下欄。

¹³² （元）張之翰，《西巖集》，卷 19，〈故昭義軍節度副使王公碑銘〉，頁 4 下欄。

伍、結語

蒙古入侵造成河北、河東、山東地區極大破壞，士民百姓或是遠赴河南或是就近避難，只為在亂世中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影響遷徙的因素眾多，既有政治認同問題，也有交通距離、地理形勢等客觀環境問題。未遷徙者如何在殘破家園生存？部份遷徙者又如何能在金、蒙對峙、戰事持續的狀態下，作出返鄉的決定？


從本文討論內容來看，「貞祐南遷」既是政治中心南遷，「南遷」也是河北士民考慮主要的遷徙方向。不過，南遷路線是多元選項，南遷者既可能是選擇河南，也可以選擇山東，也可以經由山東進入河南。就筆者掌握到的資料來說，河北士民進入河南之後，往往各自散居，並未形成「它鄉遇故知」的河北士人聯繫網，呈現與河東士人大不相同的移居現象。其中緣故，牽涉到金朝士人的地方性格，或許值得進一步觀察。

無論遷徙河南或是就近避難，興定三、四年前後都可以見到有士人選擇返鄉。此一現象也出現在河東地區。可見當河北戰事相對平靜、地方秩序恢復到一定程度之後，持續關注鄉里局勢的人們會進一步考慮：究竟要在徙居地停留多久？即使鄉里已淪為蒙古、世侯控制，也要毅然決然地回到家鄉？由此更反映出金末遷徙的複雜面向。

對於始終留在家鄉的河北士民來說，安然渡過蒙古征服戰爭時期，甚至家族發展取得成功發展，顯然是件萬分慶幸的事。真定府武強人孫善列舉「生有四幸」之事：

金崇慶末，河朔大亂，凡二十餘年，數千里間，人民殺戮幾盡，其存者以戶口計，千百不一餘，而吾與存焉，一幸也。其存焉者，又多轉徙南北，寒饑路隅，甚至髡鉗黥灼於臧獲之間者，皆是也，而吾未嘗去墳墓，且獲尉鄉縣焉，二幸也。當其擾攘時，侵陵逼奪，無復紀序，而吾四妹一弟，俾皆以禮婚嫁，今皆成家，若與世變不相與者，三幸也。平居非強宗，世亂受陵暴，自其分爾，而吾乃鄉人所推，遂得挺身樹柵，保千餘家，凡族黨姻戚，皆賴以安全，四幸也。¹³³

¹³³ （元）劉因著，商聚德點校，《劉因集》，卷9，〈武強尉孫君墓銘〉，頁169-170。

總結孫善之「四幸」，或許可歸結為一句：「讓家族鄉黨有尊嚴地生存著。」這對「千百不一餘」的二十年亂世，又是何其難得的事。

徵引書目

一、文獻史料

- (金)元好問著，周烈孫、王斌校注，《元遺山文集校補》，下冊，成都：巴蜀書社，2013。
- (金)元好問著，姚奠中主編，《元好問全集》，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 (金)劉祁著，崔文印點校，《歸潛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
- (元)脫脫等修，《金史》，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惲全集彙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元)任士林，《松鄉先生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8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光緒十六年孫鏘明泰昌刊本修補本影印。
- (元)吳澄，《吳文正公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明成化二十年刊本影印。
-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輯點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元)柳貫，《柳待制文集》，《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51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元至正刊本影印。
- (元)胡祇遹，《紫山大全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17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四庫全書錄永樂大典本影印。
- (元)袁桷著，楊亮校注，《袁桷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元)郝經，《郝文忠公陵川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抄本影印。
- (元)張之翰，《西巖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4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四庫全書錄永樂大典本影印。
- (元)張養浩，《歸田類稿》，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三集第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
- (元)程鉅夫，《程雪樓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第2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影刊洪武本。
- (元)楊奐著，孫學功點校整理，《還山遺稿》，收入孫學功點校整理，《元代關學三家集》，下冊，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
- (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 (元)劉因著，商聚德點校，《劉因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元)劉敏中,《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楊訥主編,《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39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清光緒十六年孫鏘明泰昌刊本修補本影印。
- (元)鄧文原撰,羅琴整理,《鄧文原集》,《中國藝術文獻叢刊》,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據鮑廷博知不足齋輯校稿本。
- (元)魏初,《青崖集》,王雲五主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第342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明萬曆刊本,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79。
- (明)宋濂等修,《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2。

二、專書

(一) 中文

- 三上次男著,金啟琮譯,《金代女真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
- 吳松弟著,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4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二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二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8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0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一版第一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一版第一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一版第一次印。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一版第一次印。
- 孫克寬,《蒙古漢軍及漢文化研究》,臺北:文星書店,1958。
- 符海潮,《元代漢人世侯群體研究》,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
- 陳學霖,《宋史論集》,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 趙琦,《金元之際的儒士與漢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第6冊,臺北:曉園出版社,1991。

(二) 日文

- 安部健夫,《元代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72。

三、期刊論文

王菱菱、李浩楠，〈金朝河北地區抗蒙水寨山寨考〉，《河北大學學報》，第 38 卷第 1 期（2013），頁 22-27。

到何之，〈關於金末元初的漢人地主武裝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78），頁 11-31。

洪麗珠，〈危機即轉機：金蒙之際華北新家族史的建構〉，《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5 輯第 1 期（2019），頁 61-75。

晏選軍，〈金元之際的漢人世侯與文人〉，《中南大學學報》，第 13 卷第 1 期（2007），頁 82-85。

陳昭揚，〈金代漢族士人的地域分布——以政治參與為中心的考察〉，《漢學研究》，第 26 卷第 1 期（2008），頁 103-135。

趙文坦，〈漢人世侯與蒙元關係的演變〉，《文史哲》，第 2 期（2010），頁 130-136。

瞿大鳳，〈金元之際的山西漢人世侯〉，《蒙古學信息》，第 2 期（1999），頁 2-7。

四、專書論文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柏鄉縣侍中村古墓發掘簡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河北省考古文集（一）》，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頁 338-343。

五、研討會論文

鄭丞良，〈遷都與伐宋：試探金宣宗南遷政策及其轉變〉，浙江省杭州市社會科學院「第三屆南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 年 11 月 8-9 日。

（責任編輯：杜晏汝、謝佩芳）